

杨早 萨支山 编

# 话题 2011



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

1217 俱乐部 年度书系

杨早 萨支山 编

# 话题 2011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话题 2011 / 杨早, 萨支山编 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  
新知三联书店 , 2012.1

ISBN 978-7-108-03965-1

I . ①话 … II . ①杨 … ②萨 … III . ①社会问题 - 研究  
- 中国 - 2011 IV . ① 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3870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2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数 0,001-8,0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## 作者简介



杨早 1973 年生于四川富顺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、当代文化研究等。著有《野史记：传说中的近代中国》、《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》等著作。



萨支山 1966 年生于福建福州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结业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，关注左翼文学及 50—70 年代文学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（合著）。



施爱东 1968 年生于江西石城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民俗学、民间文学、俗文学，学术论著主要有《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》、《倡立一门新学科——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、经营与中落》等。



黄永 1969 年生于北京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前驻北京记者，现为资深外媒记者、影视制片。曾在《时代周刊》发表封面文章：*SARS—What Did Beijing Know? 、SARS NATION* 等。



颜浩 1975 年生于湖南株洲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，近年来主要关注 20 世纪中国文学、民国北京的城市文化、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等课题，学术论著主要有《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：1920—1928》、《新文艺和文学遗产：闻一多演讲集考释》等。



凌云岚 1976 年生于湖南长沙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。近年主要关注区域文学与文化史、现代女性作家与社会等。著作有《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》，编有《沈从文集》，译著有《合肥四姊妹》。



**张慧瑜** 1980年生于山东郓城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和当代大众文化，近期发表论文有《“重写历史”与新主体的浮现》、《主体魅影与空间置换——从“幻灯片事件”重读鲁迅》、《从主旋律到主流大片的嬗变》等。



**刘煜** 1972年生于陕西西安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。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金属技术史。发表论文有《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演进》、《西汉日光大明草叶纹镜范的科学分析》等。



**李芳** 1981年生于江西赣州，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。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戏曲、俗文学。



**金浪** 1982 年生于重庆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。研究方向为现当代美学与文论。



**刘倩** 1972 年生于四川盐亭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古代文学博士。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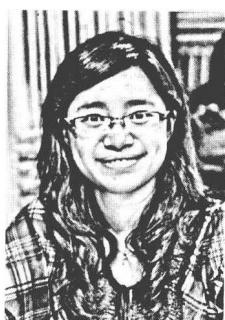
**王鸿莉** 1980 年生于山西阳泉，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。现供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，研究方向为旗人文化、北京城市研究。



**吴真** 1976 年生于广东潮州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，现任职于南开大学文学院，研究方向为古代戏曲、道教史、日本祭祀艺能，著有《唐诗地图》等。



**卢燕娟** 1979 年生于云南楚雄，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，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。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。



**倪咏娟** 1981 年生于上海，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。现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。



**赵丽苗** 1982 年生于山东烟台，中国传媒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。现为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社区工作者。发表论文《1940 年代知识分子的“建国”想象——以西南联大诗人群为中心》。

# 2011，读懂中国

杨 早

2011年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吗？今年可不像一百年前，武昌一声枪响，十四省独立的旗帜扬起，人人都知道改天换地必将到来。2011，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中，大概仍将是平淡的一年。

不过，在我个人观察史的页面上，2011会是浓重的一笔。在这一年，通往过去与未来的路途，都在重重迷雾后显出了些微的端倪，似乎头一次可以相对清晰地画出一幅游览指南：我在这里。

我们一直在说要“读懂中国”，但如何能真的读懂中国？也许必须借助这样的奇观：历史与现实的图景，穿越重重时间的尘埃叠合在一起，一些细节被遮住，一些差异被忽略。我们还需要后退几步，才能看出一帧模糊而确定的图像，那就是我们熟悉而陌生的中国。

这不是简单的“原画复现”，也不是所谓的“螺旋式上升”，它只是用隐藏在K线图、大堵车、地沟油、《乔布斯传》之后的显影告诉我们，中国在变，但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剧烈，因此当历史与现实叠合，我们似乎能隐约窥见一点儿未来——当然，那也可能是美好或黑暗的幻象。

总之，我自以为看见了什么，就说出什么。

## 过去：追忆与显形

我们活在一个价值真空的年代。“信仰危机”从上世纪 80 年代说到现在，信仰虚无已经成了铁铮铮的事实。不说这个主义那个思想，连“真善美”都没法信——谣言满天飞，而且经常是真的谣言打死不认，被指认的谣言却比珍珠还真；善吗？连个老太太跌倒你都不敢去扶……美就别提了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，连 80 后都已看不惯 90 后的非主流，切……

然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！有识之士痛心疾首。为了拯救这新千年的索多玛，各色旗帜下的有识之士开出了各自不同的药方。他们如同《蜀山剑侠传》中的剑仙们，发出或青或紫或红的一道道光芒，想照亮时代那无边无沿的黑暗心灵。

“唱红”是一味药方。与有些媒体或公众想象的“回到文革”不同，以重庆为首的“唱红”，红歌行列里几乎没有嘹亮震天的“文革”歌曲如《革命有理，造反无罪》之类，反而有不少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式的抒情音符，有的单位连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也列入选唱曲目。红歌们手拉着手，一起深情回眸，凝望离我们最近的那个价值稳定、欣欣向荣的年代，那时阳光灿烂，天暖云蓝，北京的金山上放着光芒，大雁捎来全国人民的想念……温情与激情羼合的记忆是否可以弥合历史身上的创痛与裂痕？对当下的不满与无奈是否可以消失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之外？虽然有那么多的质疑，但也有同样多的不甘：这六十年真的就有如一梦？

一个声音说：是的，一梦。当孔子像移上长安街头，又悄悄移走，有意无意地完成了某种隐喻。共和国需要孔子？它的先驱们曾经拉倒

的偶像，终于有一天借助文化强大的怀旧力重回广场——也许更重要的是，共和国需要在新世界秩序里寻找某种身份识别，于是他们在奥运会开幕式抛出了儒家团体操，掩蔽烽火连天的文化革命史的同时，似乎也在向远古呼唤文化的祖佑，那挥洒的墨迹不再是普通人笔下的烛火，正如杰克·成、杰特·李的拳脚生风不再流行于乡间的晒场。老中国是新中国试图戴上的一顶花冠，为它招徕好感、游客与好莱坞大片。

不不不。时常遥望美利坚的巫师们发出了嘘声。十年前你们为双子星的惨剧欢呼，十年后在微博上忏悔的你们终于懂得了羞愧。这是人类的惨史，这是人类的战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。然而，在微博之外，在凤凰台的镜头下，许多中国人仍在淡漠着哀伤，鄙薄着美国，他们不相信恐怖主义会散落神州，他们不欢迎世界警察，当然，他们大概也不欢迎普世价值。廿年来，普世价值在这片国土上发芽、开花，却还没有结出坚实的果子。

这是一个缺乏价值观的年代。更糟糕的是，别人找到的、塞过来的价值观，不管是外来的、远古的、近代的，似乎总不那么契合生活的尺寸。今年上大一的孩子们大多出生于1993年，他们已经受了近廿年的美式教育，却还需要不断的“他们没有那么差”的辩护声，可是他们不正是我们曾经理想中的“新人”吗？为何良好的教育、富足的环境融进社会染缸，就会酿出如许酸涩的口味？那些学国学、诵四书五经的孩子，那些读《人民日报》、看《新闻联播》的孩子，他们有更好的未来吗？

中国是个大酱缸，时间历史有这么长，你能在里面找到美味的酱，也能找到长霉白毛，只是，长的霉似乎真的多了一些……他们总说去芜存菁，取精弃糟，多少年你才能明白，芜与菁，精与糟，就是美味

的酱与上面长着的白毛。都吃下去，或都扔掉，你做得到，不知道的是，吃下去的能不能消化？想扔的又是否扔得掉？

在这样一个 GDP 大国，有钱得吓死西方的大国，却似乎人人都不快乐。回首百年前，先辈们梦想的傲立世界之林，跻身文明之国，似乎想得出来的宏大场面，都已一一在电视上实现。是现实太复杂，还是先辈们想得太简单？

说到先辈，今年出版的辛亥纪念物以百种计，“深圳读书月”却只让高全喜的《立宪时刻——论〈清帝逊位诏书〉》进入了“十大好书”行列。不管是否公允，这个结果至少反映出：评委代表的读书界是多么渴望读到这段历史的“另一种解释”。或许对于一百年前的动荡年代，高全喜等法学家的强调诏书与逊位的法理意义，多少有点脱离历史语境，然而对于当下，这种对历史的另类解读，却正能让人从百年两端相似的情境中看到摆脱“治乱循环”的某种希望。社会矛盾激化是否一定走向革命？可否通过避免颠覆性的革命以避免天下大乱的运命？这是很多辛亥研究者“压在纸背”的现实焦虑。

现实焦虑通过历史书写予以纾解，而历史反过来成为缝合现实裂隙的资源。无论是树立孔子像的跃跃欲试，还是红歌遍地的重塑光荣，更有辛亥百年的兼收并蓄，历史资源的广泛采用与重新读解，对应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失落与空虚。整个社会的愤怒与失望，不只指向权势者、有钱人与敌对势力，它也在拷问着每一个人内心。

## 现在：撕裂的社会

1911 之后的一百年，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，主流的，非主流的，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强调“统一”。关于统一的宏大叙事促成了民族

凝聚力的高涨，同时也遮蔽了这个社会内部意识的分裂。然而，当时代呈现为一派和平景象，当存亡不再是切肤的痛感，隐性的社会分裂开始在各种细小的环节爆发，那是某种无意识的回避、放弃与争夺，极易被弱化或掩饰为普通的事例与个案，却携带着百年前的基因，提醒我们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国。

年初，一名退任村长扑朔迷离地被碾毙；年尾，南海一名两岁幼女小悦悦被撞死；而年中，则是震撼全国的“7·23”动车事故。这三桩“交通事故”，挟带着不同的意涵，带给社会不同的心痛。三件事串连起来，2011便被勾勒成形。

平心静气回看钱云会事件，会发现“谋杀”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，虽然作为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，有些疑点迄今尚存。但如将其视为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，成本之高更令人难以想象。然而，当“为村长鸣冤”变成一种群体的呐喊，事实真相也变得无足轻重，钱云会已经成为一个符号，代表着民间推选出来与公权力博弈的代表人物，他的突然去世惊醒了某种情绪，也将他自己加冕成了一位捐躯赴难的勇者。

小悦悦之死则蕴藏着某种隐喻。尽管当时现场的能见度不高，尽管很多人说“没看见”，但就算看见，也未必一定上前施救。在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“留学生刺母”一案中，我们已经见识了周围人等的漠然与畏葸。正如经典道德叙事中“那一刻，我想起了雷锋（董存瑞、罗盛教）……”在那一刻，流溢在一个世事洞悉的中国人的心中，很难说是雷锋还是彭宇。既然连法官都不相信无亲无故的人会伸出援手，面对陌生的面孔避之则吉，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？所以浦东机场冲上去帮助受害者的，只有一位外籍人士，而将小悦悦拖到路边呼救的，是不识字的陈贤妹。

“7·23”动车事故被有的媒体称为“中产之怒”，因为它带给人的震撼不止于起因的离奇、死亡的惨烈以及有关部门的颟顸（同样具有这些要素的山东列车相撞事故就没有同样的效应），还在于事故本身，与中国从上到下无数人引以为傲的高铁及其象征的“中国速度”，构成了如此明显的撕裂与反讽。中国在崛起，中产在移民，这一道隐形的反向潮流，被一起动车事故刺目地推到了前台。

以上这些判断仅能限于眼前，仅能说明它们在万千交通事故中为何意义非凡。然而它们背后勾扯的微妙意义，需要更长的时段来求解。钱云会事件凸显的“土地之痛”，甚至足以不恰当地比拟为清末的保路风潮，铁路国有政策的利弊尚存争议，但国家强行攫取民众利益的做法，却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它将激起多大的波澜。假设“钱案”真是一场普通交通事故，有心人用一个谣言就能掀起举国的喧嚣，这一点比“钱云会真的被谋杀”，更发人深省。

小悦悦之死总让我想到新塘与织里。那些让人惊异的冷漠后面，是否浮动着大家有意无意忽视的地域认同与地缘隔膜？在本乡人与外来者之间，我们总能听见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区分，“他们”的事情是不是就不关我事？在手持棍棒防守与进攻的画面之前，一切和谐的假象都变得脆弱而苍白，让人忍不住会想到“土客大械斗”一类的“被遗忘的战争”。

“7·23”动车事故，很明显会带出对“急中国”的反思，或者说，对08奥运以来不断注入中国社会的各类强心针的排异。《中国不高兴》对“中国制订规则”的热衷，与中国社会对“中国潜规则”真的不高兴，也形成了某种有意味的对立。或许与之对应的，是2009年元宵节央视大火。这一把火烧掉了巨额的纳税人财富，烧出了难看的城市天际线，以常理推断，它没有任何一点正面因素，然而当时许多

北京市民表现出让人难于索解又心照不宣的欢乐。再看看今年的“拜登吃面”和美国大使骆家辉引发的热潮，你会明白，这个时代的负面情绪，在藉着每一场大火、每一次事故慌不择路地往外宣泄。

## 未来：废墟上重生

认识到社会的撕裂绝非一件坏事。像孔庆东粗口骂媒体、左派群众焚烧报纸、吴法天受人身威胁之类的现象，都不过是又一起历史类似事件的重演。不同意识形态甚至政见的对立，在这两年日益显豁，只因为“共识”已经荡然无存，共同体的幻象也就烟消云散。当我们重新面对真实的社会，反而可能成了寻觅新路的起点。

2011年，微博站在了浪潮之巅，无论是严肃认真的“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”与“免费午餐行动”，还是略带戏谑的“随手拍解大龄男女青年”，再到讨伐明星言论，批评抢盐风潮，揭露故宫事故，肉搜郭美美卢星宇……对各类公共事件的关注，以及推动公共问题的改善与解决，使微博成为中国社会民间力量聚集与增长的一个见证。很多人都说微博上乱象太盛，其实乱象一直存在，只是之前没有被聚焦与放大。也有人担心微博会建构另一种过于混乱的社会幻象，却看不到这其实是一道社会情绪的泄洪闸，定期定量的放水，才不致让千里之堤一夕溃决。

从微博的各种反应可以看出，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非真正虚无，天津司机救人反被诬陷判赔一事，双方都在微博上诉委屈，但对伦理的认知并无二致，而名人、明星的言论屡屡因微博民意的左右而调整，本身就是一种由另类而主流的舆论监督。人们会为了甘肃的校车事故愤怒，为温州的动车死难者哀悼，积极呼应寻找走失儿童的号

召，都表明“想象的共同体”亦未真正失效。微博提供的在场感与互动性，让每一个使用者更加体会到同一场域休戚相关的皮肤触觉。微博搅动着中国，让信息的封锁变得艰难百倍，诚然有时它也是谣言的温床，但以长远计，谣言又何尝不是逼迫信息公开透明的一道杀手锏？

前些年，我回家乡，或去一些别的城市，总感觉那里的许多人仿佛生活在另一时空。以中国之大，这其实是一种常态。思想的激荡，共识的形成，与传播手段关系莫大。网络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偌大空间中多重时空的叠加状态，真正将相对多数的人群拉回到一张虚拟的费城式的谈判桌前。争议、辩论、讽刺、呐喊，以至行动，一遍遍的语言涤洗之后，总会剩下一些坚固的东西。这些东西，或许就是价值废墟重建的希望。

2011年，有关“孩子”的话题特别多。我也将之视为这个社会对“未来”的焦虑与祝愿。如果不是黄艺博的事迹被人转上微博，他和父母可能还在“好孩子”的幻象里愉快地生活，舆论的冲击可能略带残忍，却至少让许多人认识到还有别样的教育观；“绿领巾”、“三色本”，其实是教育功利主义的极端显影，一向弱势的学生家长却借助舆论展示他们的不满，同时也将“反歧视”这样的大命题推进了校园。将来，一些思想在此时塑形的孩子或许会感谢这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风潮，让他们不仅仅依靠《近距离看美国》来了解现代的公正观，而是在现实中就能体验到对歧视的敏感与环境的改变。

我们可以将关于“虎妈”与“狼爸”的争论，视之为对流行教育思潮的反思与再反思。由于“中/西”的差异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再度走红，教育模式的再思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中国新一代家长大多奉行美式的自由开放教育，但如何让孩子与学校教育，直至中国社会现实接轨，却成了最头痛的课题。将“移民”作为解决方案，是成本巨大

而风险颇高的少数人行为。大部分的中国孩子，还得面对这个充满潜规则与价值陷阱的社会，身边是急功近利的学校、家长与同龄人。

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媒体热议的“社会固化”也是中国教育迫在眉睫的问题。教育历来是社会资源流动再分配的主要渠道之一，而教育资源的集中与失衡，导致“寒门无上士”的危险正在逐渐浮现。无论何时，教育资源的不平均分配，都可能让社会的未来出现结构性问题，也会拖慢整体的前进步伐，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常识。然而中国教育同样受害于功利思想的弥漫，使得“小地方也有好老师好学校”几乎变成不可能的神话，这是一条比高考更隐形却更可怕的独木桥。已有不少学者指出，一百年前，正是科举的轻率废除，新式教育成本的大大提高，堵死了社会下层的上升之途，为社会的变局种下了乱因，殷鉴不远，其三思乎！

如果 2012 的灾难预言并未成真，如果我还有幸动笔撰写 2012 的综述，我很愿意届时再回首这一年，重温这篇文字对中国的读解，得失何在？懂了几分？